

# 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

吳志良\*

回歸近二十年來，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民生以及對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和諧共生的人文景觀建設更是舉世矚目。在學術研究領域，澳門學研究已經廣受學術界重視，對其學理的研究、範式的探討、基礎的構築……已經取得累累碩果；澳門學國際研討會的連續召開，令其逐步向一門“顯學”邁進。

澳門學概念首次提出至今，已經過去了30多年。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學經歷了三波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的發展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於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談判前後，學術界集中探討中葡關係中澳門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浪潮始於21世紀初，特別是2005年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學者們自覺地探尋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進程，為新生特區的社會發展和人文建設提供理論支持；近年來，隨着澳門學作為獨立學科建設的呼聲日漸高漲，學術界在全球視野下重新發現澳門本土獨有的人文意義和普遍價值，第三次浪潮悄然興起。

自2010年以來，學術界在澳門基金會推動支持之下，先後召開了四次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屆2010年在澳門大學舉辦，主題為“澳門學研究的學理化與國際化”；第二屆2011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學舉辦，主題為“澳門學文獻調查和澳門學實證研究”；第三屆2012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辦，主題為“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以澳門學為例”；第四屆2015年在澳門大學舉辦，主題為“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分別就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文獻調

---

\* 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

查和澳門學實證研究、澳門學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等議題展開了討論，極大地推動了澳門學研究工作的進展。今年，第五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亦即將在廣州暨南大學召開。

無論澳門學是否最終能成為一門顯學，澳門研究30年來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和澳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長，已經引起國內外學界和澳門社會的普遍關注和重視，並為澳門平穩過渡、為回歸後的特區建設和“一國兩制”事業提供了有力的知識和理論支持。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令學術界引以為豪。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澳門學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思考與探究未來發展路徑。

## 一、探索澳門學研究路徑

澳門學登堂入室地作為一個學科來構建的過程中，學術界走了一些彎路，其中最大的彎路，就是從一開始便試圖構建澳門學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頂層設計是一個時髦的詞匯，但運用於學術領域，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未必行得通，缺乏足夠經驗積累設計出來的東西可能會成為空中樓閣。

學術需要創意，方法論也不可或缺，但一門學科的誕生是知識長年積累自然形成、學者默默耕耘悉心培植的過程。學術研究有別於政治社會動員和宣傳，鋪天蓋地的宣揚可能會導致學界更多的浮躁，容易造成學術研究更多的高談闊論，對學術建設本身無甚幫助。學術界很快便意識到這一點，學者們靜靜地回到了書齋。近年的澳門學研究，少了幾分熱鬧，多了幾分沉實。

由此，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推進澳門學發展的一個路徑選擇：當今澳門學研究應該放寬視野，打開格局，進入細部，深耕細作，從宏觀考慮和微觀深究兩個面向入手：其一是將其置於中葡兩國乃至世界格局、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大歷史來考察，凸顯其意義與價值，並確定其應有的位置；其二是進入澳門社會內部和細部，即對其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其運作和不同時期的城市生活進行細緻的梳理和深入

的探討。鑒於澳門學研究，特別是歷史諸多問題長期受到忽視或曲意解讀，且澳門學研究中比較缺乏深入民間的田野考察和第一手材料，中、外文尤其是中葡文史料未能全面充分挖掘、整理、比對，研究水平和質量的提升越來越艱難。唯有知難而進，將從宏觀考察和微觀深究兩個方面入手並有機地聯繫貫通，才能為構築澳門學奠定必要而可靠的基礎。

因此，在短期內確定澳門學的學科邊界、找到其適切的研究方法是不現實的。這將是學術界相對長時間內奮鬥的一個目標。在探索澳門學的過程中，路向和路徑選擇至關重要。有了正確的路向和路徑，持之以恆不斷求索，我們才有可能到達目的地。

## 二、構建澳門學三個體系

如何闡釋澳門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挖掘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凸顯澳門的文化符號和象徵意義？如何揭示澳門社會“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經驗，弘揚澳門在溝通中西文化交流和多民族融合中的優良傳統？如何在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發揮澳門應有的作用？

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亟待學術界逐步生發自主的意識和自覺的行動。有學者說，澳門學是澳門社會在文化焦慮發展的困境中提出的一種學術憧憬，其發生與發展均為澳門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學術注腳，澳門學必須走進並融入澳門社會本體，也只有這樣，澳門學才能找到本源、立足扎根。歸根到底，澳門學的構建就是構建別具特色的本土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

其核心便是緩解文化焦慮——如果這種焦慮存在的話一想方設法地衝出困境，更通俗地說，要確切回答“我們從哪裏來，在哪裏，到哪裏去”這個重大問題，為尋找和建立澳門道路、總結澳門精神而自信地提供知識支撐和智力支持。

關於澳門學的內涵和外延，學術界目前尚未達成共識。大家普遍認為，澳門學是構建本土知識和本土話語體系的載體，而本土知識和本土話語體系則是澳門學的核心內容與基本目標。在中外交往或中國

近代化“橋樑”、“平台”、“窗口”的功能定位之上，回歸澳門內部社會的演進，關注澳門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意義。當然，這不等於我們只關心澳門本土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文化，而是放寬歷史的視界，從小空間、小事件洞察大歷史、大問題，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審視澳門人、事、物的人文價值及其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

澳門學研究，應從澳門歷史發展的全域加以觀察，將澳門近500年歷史變遷與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進程聯結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澳門在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在具體內容上，澳門學的研究就像三維拼圖，把與澳門相關的每個學科、每個時域的知識板塊結合起來，才能築成其完整的學術圖景。為此，對澳門學採取的哲學立場，學術界應該是實證主義和演繹主義並舉，根據研究課題的性質、研究資料的保存狀況進行彈性處理和綜合考量。

從外部視角出發的解釋體系，多是建立於外部歷史經驗上的理論歸納；而作為本土知識體系的解釋框架與移植，應是依據本土的歷史經驗抽象而成。局外與局內，互為參照，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 三、掌握澳門歷史研究話語權

在澳門問題談判期間，中葡兩國政府都希望建立自己的歷史敘述，爭奪對澳門歷史的話語權。為此，早期澳門研究天生攜帶民族主義的基因，中葡雙方在澳門多個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和爭議，導致關於澳門歷史和文化的敘述彼此差異甚大乃至相互對立。伴隨政權順利交接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政府與社會進一步完成中文官方地位、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澳門歷史和文化敘述也從葡萄牙主導逐步過渡到中國主導。

回溯30多年來的澳門學術史，一個顯著的趨勢是學術研究逐漸擺脫政治爭拗的束縛，告別民族主義爭議色彩，聚焦於澳門內部社會的演變歷程及其現實意義。雖然內部社會演變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敘事的視角不可逆轉地指向了內部社會。這種轉變，是革命性的、開創性的、歷史性的，其結果或標誌，便是有關澳門歷史的話語權悄然回歸了。

其基本表現可以概括為：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日漸凸顯，在視角、史觀、觀點、成果、人才等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地彰顯由外及內、由表及裏的態勢。這一態勢主要表現在，研究主體、研究方向、研究主題、研究意識、研究方法甚至學術規範的本土化。

如果從澳門史學史的發展歷程進行觀察，歷史知識的取得從過去由埠外學者控制，逐漸轉變為由本土學者主導，研究主體也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進軌迹。具體來說，一是以澳門人述說澳門史為主體的內部視角的興起，逐步取代了以往主要由葡萄牙、中國內地、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學者書寫澳門歷史。這在通史編撰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代表澳門地方視角的通史性著作近年來逐漸增多。

以往研究主體主要探討城外問題，包括中葡政治、中葡關係、中外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等，而關於本土社會的管理和運行軌迹的論述明顯不足。近年來，澳門作為一個城市個體的運行軌迹、發展變化，已成為學術界的重要議題。近代澳門城市的形成、社會組織的管理與運營、華商群體與社會轉型、華人政治文化與身份認同、澳門與抗日戰爭、澳門文學藝術與地方化等專題性的開掘日益增加，而且從本地視角和本土問題出發，逐漸擺脫政治化和城外化的藩籬，新見迭出。

在深度方面，澳門回歸前，研究工作多集中在基礎資料的梳理和重大政事的考訂上；回歸後，因應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學術界開始結合學術理論從事各類型的實證研究，研究方法也從以質性研究為主，發展為質性與定量研究並重，且注重多學科的交叉與融合。

以往研究者主要是以葡萄牙和中國內地學者為主，代表本土聲音的學者相對缺乏。近年來，一批澳門籍或在澳旅居的學者，既掌握社會科學的知識與方法，又逐步掌握多種語言工具，熟悉本土歷史與社會，逐漸成長為澳門史最重要的學術力量之一。

以本土視角解釋的澳門歷史更加接近歷史的原貌；否則，將無法解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彈丸之地和睦共處數百年的事實，無法解釋它們之間是如何對話、溝通、交匯的，也難以找到核心價值和力量源泉去維繫和構建澳門這個多元並存的共同體。

以史學研究為例，亟待建立與澳門人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相適應的史觀與史學。由於澳門歷史研究最早是圍繞中葡主權、治權之紛爭展開的，從一開始就染上了極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兩國政治家、史學家對澳門歷史的敘事與解釋長期存在巨大的分歧，在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上甚至南轅北轍。

其核心內容也長期受限於政治史、中葡外交史、中外交通史的主線，無法轉向本地社會內部演進的研究。在這種學術話語環境中，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及其解釋體系的建構自然無從談起。學術界應該在海內外研究力量的協助下，積極挖掘整理龐大的多語種史料，逐步建立自己的歷史解釋體系，使澳門歷史的敘述回歸本真，澳門歷史研究更加接近事實，歷史敘述更客觀、科學、合理，更具親和力。

10多年前，我在研究澳門政治發展史時，提出了“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的論點，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讚譽、分歧、批判乃至駁斥同在。但隨着大量檔案史料的披露和更多研究成果的發表，大致印證了當年的論述和觀點。一個地區、一座城市的歷史是由當地居民創造的，也唯有通過當地居民的講述與闡釋，其歷史才更具本真性，更有親切感。

澳門之所以形成今天開放、包容、多元的格局，是因為澳門自一開始就是中國最早對西方開放的城市之一，始終處於宏大、多維的參照系中，在容忍、承認、尊重、信任、合作、互助等基本價值上與不同文明展開長期對話，從而養成和保持“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態以及“不走極端、沒有悲情”的精神品格。

澳門歷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和澳門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應該以一部“官修”的澳門通史型著作加以體現，因此，我想，在條件更成熟的情況下，應該將《澳門通史》的編寫提上議事日程。每個時代應有至其時的“通史”，懇請諸位同道共同努力，早日圓夢。

#### 四、解答澳門學的三個具體問題

澳門作為明中葉以來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以獨特的魅力吸引和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文化、宗教、信仰，共生共

長，成為16世紀至今東西方文明交匯的中心之一和西學東漸的前沿陣地。然而，在皇權體制和大一統政治秩序下，以葡萄牙為主的西方文化的滲透往往受到極大的限制。具體到澳門政治發展史上，就是我們早年所概括的“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即在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移民社會裏，不同族群同處共存，在接受明清中國主權治權主導管理的同時，葡萄牙人社群又獲默許，依葡萄牙中世紀地方自治傳統成立議事會組織進行內部管理；而且隨着自治權的不斷擴展，葡人實際上擁有一定的政治行政權力。但在重大政治法律權力問題上，居澳葡人依然不得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制約，客觀上造成了他們既效忠於葡萄牙國王又不得不聽命於明清官員的奇特局面。

澳門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核心，在於從思想上、理論上回應澳門的歷史、實踐和經驗。現階段，我認為，澳門史研究的中心任務（澳門學的歷史任務）亦即我們需要以客觀、理性、科學、求實的態度以及澳門人特有的寬宏包容精神來解答的問題有三：

1. 正本清源，確認歷史的主體性，即其集體記憶中的“集體”是指哪些人？
2. 消除模糊狀態，恢復歷史原貌，即澳門歷史中哪些事件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回避、隱瞞或扭曲了，是否可以或將如何還原？
3. 在重構澳門歷史全景的基礎上，構建自主的澳門史解釋體系。澳門歷史長期以移植的理論框架來解讀，而且這些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舊理陳說影響甚廣，如今我們怎樣從外部維度轉向內部視角，從先入為主走向實事求是，尋找一條可行的理論路徑，以建立一個屬於澳門自己的歷史解釋體系？

要解決上述三個問題，必須有新思維、新方法和新材料。不僅需要本土視角，需要將研究主體從中葡關係史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變，更需要本土學者的積極參與。

對此，澳門學界近年已有所關注和討論，而且部份學者已經身體力行，展開了初步嘗試。然而，這三大任務不是幾個研究者可以獨立承擔的，需要一大批研究人員攜手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需要有

意識、有組織、踏踏實實地在不同層次以多種形式開展具體的研究，尋求學術突破。

以往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內部社會的嬗變遭到忽視，澳門研究和敘述的主體性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現在澳門學必須面對和解決兩個問題：“澳門學”的實質內容是甚麼，應覆蓋哪些學術領域；對“澳門學”應採取甚麼樣的哲學立場，也就是本體論的問題。

## 五、建立澳門學的解釋體系和學術範式

如何從文明對話出發，闡述澳門文化、澳門現象、澳門模式、澳門精神的內涵與特徵，建立獨特成形、嚴謹科學的解釋體系和學術範式，是今後澳門學面臨的重要課題。

現在，我們更注重從文化價值上解讀和闡釋澳門。澳門地處邊隅，長期以來都不十分引人注目。近年來澳門之所以被發現和注意，源自於其所代表的獨特的文化意蘊和政治內涵。早於明清之際的中西早期接觸中，澳門為兩種甚至多種異質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一座橋樑、一個舞台和一塊緩衝地。明朝中後期及清中葉後中西兩度隔閡，澳門為東西方思想文化和經濟貿易的交流保留了一條窄小而順暢的通道，令其溝通不至於完全中斷。正是在這一歷史機遇下，澳門逐漸形成兼收並蓄、包容共處的特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風俗、不同文化共存共進、和睦相處、平等對話，“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共同搭建了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圈點了一個閃亮的符號。

事實上，最早提出“人類文明實驗室”概念的是生活在澳門的一個葡萄牙學者。可以說，無論對於中國和西方，澳門都是一個特有的文化符號，具有歷史的傳統與中西交流的經驗，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不多見的。

澳門研究以往側重東西方文明的接觸、衝突與融合的歷史呈現；而如今研究視角轉向世界文明地域化的生態形式和存在方式，即探討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闡釋作為“人類文明實驗室”的澳門模式和澳

門價值。在400多年的發展與磨礪中，澳門養成了兼容並蓄、互讓互諒、敞開胸懷的文化性格，創造出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共生共存的社會景觀，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對話的“公共空間”。

同時，澳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地位，使其兼備多重社會身份認同，形成獨特的話語體系，從而方便並增進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對話和理解。今天的澳門是從殖民政治走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殖民社會的轉型與再造，因此具有重大的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可以為同類型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探索可行路徑。

## 六、積極推動澳門學研究

30餘年來，澳門基金會竭盡所能地扮演推動者、組織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和學術界同道攜手並肩，從未在創建澳門學的追求中鬆懈卻步。

澳門基金會深信，推動澳門本土學術研究，既有助於推動澳門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也有助於建立澳門特區對外的“軟實力”，有助於更好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有助於在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過程中貢獻綿力。澳門基金會堅持不懈地推動學術研究的工作，是因為要建成一座大廈，需要有藍圖、有計劃，需要有章法和步驟，更為重要的，還得有一批充滿熱情的建設者。

這座大廈的落成，將充滿着我們的經驗、記憶、知識、智能和精神力量，還有人性的光輝。而正是人性的光輝，使得小小澳門在人類文明史上閃閃發亮，也賦予澳門學術研究一層特殊的意義。

澳門基金會推動學術研究，要從基金會早年面對的組織轉型說起。1988年，當時的澳葡政府當局收購了東亞大學，交由澳門基金會負責管理，同時負責構建適應澳門社會需要的高等教育體系。這個階段工作完成之後，正值《澳門基金會章程》需要修改，於是便提出把基金會發展成研究澳門和中葡關係的一個平台。其實作為一個公共機構，這不但是澳門基金會應有之義，也要求有一套通盤的計劃，不能

盲目跟風，隨波逐流，必須制訂一個長遠目標，那就是為澳門建立起一套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澳門系統的學術研究起步較晚。

隨着1970年代經濟加速發展，到1980年代政治、文化和社會發生劇變，尤其是在澳門進入主權回歸過渡期後，社會對澳門歷史和現實問題的討論多了起來。而我們在組織一批專家學者編輯《澳門總覽》時，發現大家解讀澳門問題往往都是點到即止。當再進一步去深入探究時，只可以單憑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初步甚至感性的認識去下結論，導致在嘗試解答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時，不少見解似是而非。這種情況，不利於真實把握過渡期複雜的社會現實情況，也不利於特別行政區的創立。澳門基金會決定加強對外合作和組織研究力量，加大資源投放，全面擔負起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重任。

就在同一時間，澳門開始冒出一批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才。他們在修讀碩博課程時撰寫的畢業論文，不少都與澳門有關。我們認為這些論文有一定的出版價值，不論是結集成書出版，還是節錄後通過學術期刊發表，都可以為解答澳門社會的深層次問題提供寶貴的參考。於是，我們首先決定與澳門大學商議恢復出版《澳門研究》期刊，並構思以叢書形式，系統地出版與澳門有直接關係的研究論文、報告和專著。同時，組織專家學者在《澳門總覽》的基礎上，針對特定社會需求，編纂基礎資料，最先形成《澳門叢書》和《澳門論叢》系列。在實踐的過程中，多角度、跨學科、全方位研究澳門的構想也漸漸成形，並且逐步完善落實。

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我們把焦點集中在文史編輯方面，先後推出《澳門叢書》《濠海叢刊》《新澳門論叢》和《澳門譯叢》等系列。同時也與內地、葡萄牙的檔案收藏機構合作，系統地整理編譯和出版了明清時期的澳門文獻檔案，為澳門學術發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礎。我們還因應法律中文化的需要，推出了《澳門法律叢書》系列。

在這個時期，澳門基金會在研究出版領域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百科全書》。這是澳門第一部百科全書，全面系統地以詞條形式，簡明而深入地闡述澳門、

解析澳門，是構建澳門學的初步嘗試。另外，與中國文聯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文學叢書》，首次系統地對外展示澳門本地作家的創作成果。

澳門回歸祖國之後，澳門特區政府通過合併原澳門基金會和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而成立了新的澳門基金會。新的澳門基金會秉承過去推動學術研究的傳統，著重澳門學術研究成果的對外推廣。我們首先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合作，發行《澳門叢書》；接着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發行《澳門研究叢書》《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發表年度《澳門藍皮書》；與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藝術叢書》；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發行《澳門知識叢書》；與作家出版社合作發行《澳門文學叢書》；與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合作出版葡語專題圖書等。借助外地出版社的豐富經驗和發行網絡，使澳門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成果的整理與展示更全面、更立體，傳播範圍更廣。

至此，我們已經大致為澳門勾勒出一個涵蓋不同學科、以歷史文化為起點的基礎知識體系的輪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相反是進入另一個新階段。目前我們要做的工作有兩層：

第一層是進一步整理、整合本土文化資源和研究力量，提升研究水平和質量，豐富完善知識的展示內容和方式。例如，我們參與了中央文史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的工作，組織編撰了“澳門卷”；現正與文化部合作編纂《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全方位系統整理本土民間文化。另外，我們內部也正在開展“澳門記憶”數據庫項目。當然，還繼續每兩年舉辦“澳門文學獎”、每三年舉辦“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以及每年連續舉辦“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和“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鼓勵創作和研究、豐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時，為本土的文化藝術表達留下寶貴的記錄。

第二層是從理論上進一步推動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實質進展，集結本土和世界各地專家學者的力量和智慧，通過組織學術課題研究、舉辦“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與國外學術機構合辦各類專題研討會持續推進。

澳門基金會在學術領域基本上圍繞如下幾點展開工作：廣泛聯繫團結內、外研究力量，並創造條件令其不斷發展壯大；調動和引導研究力量進行不同領域、特別是基礎薄弱學科的研究，促進澳門學術的全面發展；着力檔案、史料、資料以及學術成果的挖掘、整理和出版；推動澳門學的理论闡釋與建構。

這些工作，需要澳門內外相關學者和機構的通力協助與合作。一直以來，我們不僅支持本地的研究，也與外地相關學者合作；不僅支持高校進行研究，也支持社團開展項目。應該說，20多年來，澳門基金會成為了澳門學一個重要的推動者、組織者。我們會一如既往，繼續投放資源，爭取更多的成果。